

李潔非明史三部曲

The History of  
the Ming Dynasty

# 弘光紀事 黑洞

李潔非

著

開明書店

# 序一

大概而言，本書為一史傳敘事作品，但筆者私衷卻是史傳敘事其表，思悟認知其裏。蓋所謂史傳者，大開大闢，奇崛跌宕，人易以故事視之，猶如讀小說、聽說書，目眩神迷，不覺而將其文藝化。其實，史傳乃是極有力的思想認識方式和工具。許多以讀書為業、自命足以勝任思考的人，往往將思想等同於理論，甚而只知從理論上求之。這種誤區，尤當思想、學術嚴重格式化，讀書和著述僅為博取功名之器藝的時代，益滋其彰。其表現，我們不必到遠處去找，眼下就很典型。歲歲年年，從學術考核制度，從學位、晉職競爭中生產的論文汗牛充棟，而內容空疏、言不及義者累累。當下知識者中每可見兩種情形：一、與現實有繭疥之隔，搔不到癢處、揭不了瘡疤，論來論去，思想只在一些似是而非的術語中打轉，和科舉制藝如出一轍，此謂「無補於世」；二、對歷史，不光觀念混亂、錯誤而不自知，又陶醉於某些徒具其表的義理，從理念到理念，從空想到空想，據之對歷史東拼西湊、強以就我，甚而不惜味實而論，此謂「學不成器」。黃宗羲說：「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為俗學。」<sup>①</sup>三十多年前（「文革」結束時）國人精神世界細於「讀書不多」，而今，病根卻在「不求於心」——讀書不少，心思仍舊昏憤。何以如此？有的是被應試教育所害，讀書不為求知，目的盡在出身、文憑。有的則是根鬚扎錯了地方。黃宗羲說：「拘執經術，不適於用，欲免迂儒，必兼讀史。」<sup>②</sup>古人是拘執經術，今人是拘執義理，而實質總歸一條，即頭腦已被格式化，雖然也思考，也貌似產

① 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黃雲眉選注《結埼亭集文集選注》，山東人民出版社，1982，第105頁。

②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16頁。

生思想，但根鬚卻扎於先入為主的理念，不是扎在客觀事實的土壤中。這就是「迂儒」，他們有些人的表現，往往比「迂」嚴重得多，其對義理的癡迷、對客觀的排拒，可能達於偏執的地步。為了不至於此，或已然如此而願意有所改益，有效辦法是接受黃宗羲的建議「必兼讀史」。讀史，首先是樁令人愉快的事，有着如對小說一般甚至超過它的樂趣，但這是極次要的。它真正的好處是使人離真相更近從而明辨是非，搜讀益多益廣，這功效益發明顯、確鑿，世間最不容易蒙蔽之人，便是飽於讀史之士；其次，讀史能夠大大彌補空頭理論的各種不足，甚至回過頭反思理論，重估它塞到我們腦中的那些觀念。言及此，想起梁啟超的評論：「大抵清代經學之祖推炎武，其史學之祖當推宗羲。」<sup>①</sup>我從這句話所得，不只是兩大師治學各有所重，進而更在於，黃宗羲何以要將最大氣力用於史學？這很值得深思。以他學問之廣之深，這一定是出於鄭重、特別的選擇。我以為，那是對自己時代現實審視、判斷的結果。明亡之後，痛定思痛，一代碩學依各自認識展開反思和總結；而在黃宗羲看來，明代近三百年人文的弊端，主要在於空談許多義理，對歷史卻認知力嚴重不足。所以他的批判，不特別致力於理論，而集中在史學層面，通過摸索歷史，得到和浮現真知。體會、揣摩這一思路，我覺得對於當代有極大參考意義。回看半個多世紀以來，根本問題也是義理過剩而史學不足。陳雲曾講「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sup>②</sup>，這是從國家政治層面對歷史教訓的總結，倘從精神思想層面看，相通的問題其實便是在義理與史學之間更應依憑和尊重什麼。考諸現實，令人意外的是我們在國家政治層面基本已能採取「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態度，反倒是精神思想層面義理過剩而史學不足的情形沒有多少改變。在「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年代，不必說義理壓倒一切，史學則完全沒有空間抑或是被義理「掛帥」的史學。「文革」終結，改革開放，思想學術似乎漸至多元，但深入觀察，尚好主義的風氣依然獨大，基於

①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17頁。

② 《陳雲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71頁。

事實的討論迄無多少餘地，某些慷慨激昂之士，盛氣凌人、泰山壓頂，以至置以粗口而有恃無恐，其所恃者何？無非是義理握於其手。但義理在手為何就如此強勢？將根由追索到底層，我以為是歷史檢討不足。因為歷史檢討不足，許多事實沒有釐清，或雖已釐清卻沒有進入公共知識領域、向社會普及，致一般人的歷史認識仍處於某些義理覆蓋之下而非來自歷史事實本身。既有此「知識背景」為雄厚社會基礎，就難怪有些人出言強悍，氣吞山河，總有「朕曰」口吻，動輒置人罪不容誅。當下中國精神思想如欲走出這種氛圍，別無辦法，非得像黃宗羲那樣，扎實地做史學功夫，辨偽訂訛、澄清史實，同時帶動社會有讀史的意識，逐漸建立不論什麼義理都要附麗於史、接受歷史檢驗，否則就是空頭說辭的認識。

中國能否更智慧、更清明，頗待乎一個全民讀史的浪潮。極而言之，詩歌、小說、哲學、道德……將這些暫時放下不讀，都不要緊，但一定要讀史。眼下我們不急於理想，甚至也不急於情感，所急者首先是事實。基本事實都不甚清楚，卻憧憬理想、抒發情感，又如何靠得住？讀史，就是尋找並確定事實的過程。有些人的談吐和舉動，一眼可見起於對歷史了解不夠。關於「文革」就是這樣，我們在身邊屢能發現有人心中至今為「文革」義理留一塊領地，乃至還以此為批判現實的武器。這固然可悲，但我想其中相當的一部分（特別是年輕人）未必真的了解「文革」，使他們有如上思想感情的根因，其實是「文革」史學的不足，令那種義理仍能有所附麗。

總之，史學確是當代思想一個關鍵方面。幾十年來，義理對史學深度注入，形成許多定式，令人們以為自己在接觸歷史，實際不過是接受義理。這遠非在當代史中如此，現代史、古代史甚至史前史，都存在從某種義理而來的固定格式。舉個很明顯的例子，歷史教科書一直把到1840年為止的中國定義為「封建社會」，把相應歷史稱為「封建史」。其實，自嬴政這位「始皇帝」起，中國就廢止了封建制，漢代初年略有反覆，不久也徹底取消實封，以後歷代封王建國都僅為虛封，亦即受封之王有爵號有封地，但並非政治經濟上的獨立國。1973年8月5日，毛澤東有七律《讀

〈封建論〉呈郭老》，云：「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sup>①</sup>說得很清楚，秦以後中國已經沒有封建制，「百代」所行，都是嬴政始創的中央集權或大一統君權專制。那麼，為什麼教科書會無視這一點，而將二千年來中國冠以「封建社會」「封建時代」之名？原因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建立了一個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五大階段的社會發展史模型。本來，這一番總結，所依據的主要是歐洲史；在歐洲，直到近代資本主義之前，確實處於完整的封建形態。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不曾系統研究過中國歷史，並不了解從帝制中國的集權形態，他們的理論無從考慮和吸收中國的歷史經驗，這本來沒什麼，問題是，當馬克思主義作為政治意識形態，上述社會發展史模型被奉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必由之路」，只能遵守，不能旁生枝節。因此，便讓中國歷史削足適履，將明明不屬於封建形態的中國帝制史硬套為「封建社會」。其實，以中國歷史實際，不單「封建社會」之說是穿鑿附會，連「奴隸社會」的存在，也並不能從史料上落實。顧名思義，「奴隸社會」即應以奴隸制為社會基本關係，但至今不論文字上還是器物上，我們都不能完全地證明，中國曾經有一個奴隸制階段。否則，其始於何時、崩於何時，歷史上會有確切的標誌和概念，可是並無任何歷史學家對我們能夠以此相告。郭沫若曾將一些論文編在一起，取名《奴隸制時代》，但裏面的論述多不令人信服。我們見到的常常是一些字形字義的詮釋，某字像是奴隸情形的表現，某字有受人奴役的含義等。他唯一肯定的結論是：「殷代是奴隸制」<sup>②</sup>，但即使在殷代，連他自己都說：「『當作牲畜來買賣』的例子雖然還找不到，但『當作牲畜來屠殺』的例子是多到不可勝數了。」<sup>③</sup>我們知道，奴隸是奴隸主的財富，是奴隸主的生產工具，奴隸主擁有奴隸絕不是為了用來殺掉的，如果連買賣奴隸的跡象都找不到，卻以「當作牲畜來屠殺」為奴隸制存在的證據，那麼中國及世界上的奴隸制不知要延續到何年何月了——希特勒集中營裏的猶太人不

①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第361頁。

② 郭沫若《奴隸制時代》，人民出版社，1973，第17頁。

③ 同上書，第25頁。

也是「當作牲畜來屠殺」的嗎？其實在很長時間中，確切講，整個世界來到「現代」階段以前，奴隸或奴僕的社會身份都不曾消除，但這與整個的「奴隸制」或「奴隸社會」究竟是兩碼事。難道我們可以因為直至明清仍能見着太監這種奴隸式現象，而稱那時中國為「奴隸社會」麼？或者，把林肯以前的美國稱為「奴隸社會」？總之，過去教科書所劃分的中國史，除了原始社會，都未必合於實際。像奴隸社會的問題，本身史料不足，尚可存疑，以俟進一步的文獻發現或考古發現。但「封建社會」之子虛烏有，卻確確實實、一目了然。連偉大領袖都教導我們，秦始皇之後「百代」再無封建制，封建制在中國是遠在周文王時代的事情，可見1840年之前中國是「封建史」之論，何其睜眼說瞎話。這正是我們史學中一個為遷就義理而強扭事實的充分例子。這錯誤好像至今仍在延續，和筆者當年一樣，一代代學生仍然從課堂接受對一種並不存在的歷史的認識。如非後來在教科書外多讀多想，我亦無從知道所學知識裏包含如此嚴重的不實，一旦意識到，我即自誠日後凡涉及中國帝制以來歷史，堅決不用「封建」一詞——藉此機會，同樣提醒讀者諸君。<sup>④</sup>從中我還反思，它不光給了我們錯誤的知識，更阻隔或關閉了對中國歷史真境況和真問題的探究。大家都去談論並不存在的「中國封建社會」，而置二千多年的集權專制、大一統君權這一真正的「中國實際」於不論。我們身處中國卻跟在歐洲歷史後頭研究「封建社會」，本身讓人啼笑皆非，更不幸的是，我們因而不認識自己的歷史，不清楚它究竟是怎樣形態、存在什麼問題。至今，我們的歷史批判所以不深不透，恐怕與此有很大關係。

可惜，情況到現在也還沒有顯出多大的改良。中國史學界，不乏刻苦用功的人，也不乏學問滿腹、鑽研精深的專家，但似乎始終缺乏當代黃宗義，缺乏那種能將史學提升為一種思想認識管道的人物。在局部的一件事、一個問題，或一個歷史人物的研究上，我們每每能見精詳豐瞻

④ 順便指出，所謂「五四運動」提出過「反帝反封建」口號，也純屬「錯案」。學者李新宇有文《五四「反帝反封建」辨析》，以詳備的考據，相當有力地說明當時根本不曾有這口號，尤其「反封建」提法，更是「五四已經過去幾年」（亦即馬克思學說開始在中國傳播）後方才出現。文見《齊魯學刊》2009年第3期。

# 目錄

序一	iii
序二	xviii
序三	xxviii
國變·定策	001
四鎮·武人	027
虜寇·坐斃	057
桃色·黨爭	085
降附·名節	123
錢穀·貪伎	159
民心·頭髮	209
真假·謠言	249
曲終·筵散	283
遺民·苦悶	315

# 國變 · 定策

Chapter 1

古云：國不可一日無君。4月25日以來，崇禎死國、北都淪陷，是明朝所受兩大重創。但換個角度也不妨說，明朝雖然頭破血流，卻筋骨未傷；北京統治機器雖然瓦解，南京這套備用系統卻完好無損，並且能夠立即啟動、投入運行——刻下，它只是缺少一位國君而已。

## 一

自倒數兩個王朝起而至現代，約七百年間，大事基本發生在兩座城市之間。

朱元璋在南京立國，「靖難」後，朱棣將首都遷到北京。清祧明祚，亦定鼎北京。清室遜位後，中華民國的國都之選，與明初剛好反向而行：先北京，北伐後南遷南京。逮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首都又從南京返於北京。

其間，南京曾四度告破。一破於朱棣「靖難」大軍，二破於滿清統帥多鐸，三破於洪秀全，四破於中國人民解放軍。這四次城破，除洪秀全那次，北京都曾從中受益；似乎南京之衰即是北京之盛，裏頭的淵源着實堪奇。

連帝制下最後兩起大規模農民起義，亦於這兩座城市取得最高成就。它們之間還有一個相映成趣的現象：洪秀全打下南京後，對以後的事情既似乎失去興趣，勢運亦到此為止，不能再越一步，雖象徵性地派出北伐軍去攻打北京，卻仿佛是姑且表示一番而已。李自成剛好相反，在長城—黃河間縱橫馳騁，乃至摧枯拉朽直搗北京；然而，踰此範圍則屢吃敗仗，洛陽執殺福王朱常洵是其平生大捷之中最南者，再南輒不利，最後死在鄂贛交界的九宮山，差不多也是他一生所到最南端。

## 二

兩座城市之間的故事，多少有些神祕。

1644年春，它們的處境有天壤之別。一邊，烽煙四起、城碎牆殘、君王殞命、人心惶惶，另一邊則安寧如故。截至此時，長江三角洲在滿目瘡痍、遍佈禍亂的明末，獨能置身事外，兵燹遠隔，桑梓仍舊。王朝第二政治中心南京，安居樂業，街陌熙攘，秦淮河畔偎紅依翠的風情絲毫未受打擾。

東南的靜逸偏安，透過一個細節表露無遺——崇禎皇帝4月25日駕崩，足足過了十一天以至更久，南京才隱約聽到點什麼。諸史一致記載，

5月6日（四月初一戊午），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等舉行「誓師勤王」儀式。注意「勤王」二字，換言之，此時南京得到的消息，只是京師告急。真實情況卻是，他們已無王可勤。勤王部隊剛過長江，就在北岸的浦口停止前進，這時大概有了進一步的消息。計六奇說：

（三月）廿九日丁巳（5月5日），淮上始傳京師陷，眾猶疑信相半。<sup>①</sup>

阻止部隊北上的，恐怕就是這一「淮上」消息。然而，消息內容只提到「京師陷」，未含皇帝下落，而且來源也很不可靠，使人將信將疑。究竟發生了什麼，準確信息直到5月15日（四月初十丁卯）方才到達：

丁卯。京營李昌期至淮安，告巡撫路振飛以大行之喪。振飛集士民告以大故。<sup>②</sup>

又經過兩天，同樣的信息送到南京：「四月己巳（5月17日），烈皇帝凶問至南京。」<sup>③</sup>《國榷》則記為庚午日（5月18日）「先帝凶問至南京」<sup>④</sup>，相差一天。對於這樣特別重大的變故，理應慎之又慎加以核實，所以又經過十三天，到5月30日（四月二十五日壬午），南京官方最終完成了對噩耗的確認：「壬午……北信報確，史可法約南京諸大臣出議。」<sup>⑤</sup>

也就是說，東南一帶普遍在舊曆四月二十五日以後知悉巨變。這一時間表，證以計六奇的回憶：「四月廿七日，予在舅氏看梨園，忽聞河間、大名、真定等處相繼告陷……廿八日，予下鄉，鄉間亂信洶洶。廿九日下午，群徵叔云：『崇禎皇帝已縊死煤山矣。』」<sup>⑥</sup>很能吻合。

此時，距崇禎之死已一個月零五天。

倘在今天，如此驚世之變，將於幾分鐘內傳遍環球，而三百年前卻輾

① 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2008，第1頁。

② 談遷《國榷》，中華書局，2005，第6071頁。

③ 顧炎武《聖安皇帝本紀》，《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96頁。

④ 談遷《國榷》，第6073頁。

⑤ 同上書，第6078頁。

⑥ 計六奇《明季南略》，第7頁。

轉月餘。這固是通訊原始所致，卻並不完全因此。北京距南京約一千一百公里，假如一切正常，當時條件下像這樣重大的消息，以第一等的傳驛方式可在三五天送達。之所以耗時多至十倍，實在是一南一北已陰陽兩隔，而中原板蕩，有如飛地，為潰兵、難民所充斥，一片亂世景象。

工部員外郎趙士錦，5月19日（四月十四日辛未）逃離北京，和方以智等結伴南歸，「行旅頗艱」，「相戒勿交一語」；經過二十天，五月初五端午日到達淮撫路振飛控制下的清江浦，最後回到故鄉無錫已是6月21日（五月十七夏至日）<sup>①</sup>。這個經歷，我們可以作為崇禎凶問曲折南下的參考。

由趙士錦的講述，我們還略知北變之後沿途各地的情形。從天津經滄州、德州、茌平、高唐至濟寧一線，明朝統治已經解體，李自成勢力則正向這些地方滲透。在德州和濟寧，趙士錦都曾目睹和北京相同的闖軍拷掠士大夫的場面。濟寧以下，徐州、宿遷至清河（今淮安市淮陰區）間，為緩衝區；五月初四夜，趙士錦看到「煙火燭天，光同白晝」，「吾兵燒青（清）河縣也」——可見對這一區域，明朝已毀城棄守。過了黃河（此時黃河入海口位於今江蘇濱海縣境內），清江浦以南，才在明朝實際控制中。

顯然，在南京北面橫亙着兩道天然屏障，第一道黃河，第二道長江。因為它們，南京得以把自己跟戰亂隔開。雖然北變音訊傳來後，空氣也變得緊張，南京一度戒嚴<sup>②</sup>，而趙士錦從淮安乘小舟繼續南歸途經泰州、丹徒時，則被「防禦甚嚴」的鄉兵（民團）拒絕登岸，「刀棘相向，奸與良弗辨」<sup>③</sup>——一定的恐慌也許難以避免，但比之於中國其他地方，這一帶看上去似乎是世外桃源。也許天險可恃，也許人們覺得作為本朝龍飛之地，這裏元黃毓粹、王氣猶存，是塊天生的福地。

### 三

這種感受或想像，廣泛存在於人們心頭，尤其北方那些宗藩、官僚、

① 趙士錦《北歸記》，《甲申紀事（外三種）》，中華書局，1959，第23-24頁。

② 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1頁。

③ 趙士錦《北歸記》，《甲申紀事（外三種）》，第24頁。

將軍和富室。自從北方局勢惡化以來，南逃之人便絡繹於途，其中有兩種人需要格外注意，一是手握重兵的武人，一是皇室宗親，他們對以後的事，都將施加重要影響。

早在4月中旬（舊曆三月初）京師陷落以前，各宗藩就開始「棄藩南奔」，時間大致在4月10（三月初四）左右，他們不約而同奔淮安而來。截至4月27日，淮安已出現了四位親王，分別是來自開封的周王、來自衛輝的潞王、來自汝寧的崇王，以及領地在洛陽、數月來一直流浪的福王。

計六奇說，最早到達的是周王（三月十一日以前），其次福王（三月十八日），最後是潞王（三月二十一日）。<sup>④</sup>其他作者所記，一般是福王與潞王同時抵達。文秉《甲乙事案》則說諸藩並至，還描述了當時的場面：

是時，各藩俱南奔，淮撫路振飛親駐河干，以令箭約諸藩，舟魚貫而進。<sup>⑤</sup>

關於其中經過，一種說法是正月庚寅日（1644年大年初一）闖軍破懷慶，暫棲於此的福王逃脫，北上衛輝依附潞王，復於三月初一隨潞王南至淮安。<sup>⑥</sup>另一種說法，河南大壞後周、潞、崇三王各自逃出，在曹州匯集，由水道南下；途中，四處流浪的福王看到這支船隊，「乃趨入舟邊，訴履歷於三王」，所幸舟中有兩名太監原在福王府供職，「識故主」，為之作證，這樣福王才為三王接納，「遂同舟下淮安」，這是當時南京市民廣泛口傳的故事。<sup>⑦</sup>離亂之世，各種說法也許都不確鑿，我們能夠注意的，是福王在其中格外慘澹的處境。

計六奇又說，在淮安那段時間裏，福王「寓湖嘴杜光紹園」，周王、潞王輒以「行舟皆泊湖嘴」<sup>⑧</sup>。這也是一個要品味的情節。雖說諸王均在流亡中，其他人卻「各以宮眷隨」，都還保持着親王的派頭與生活，「獨福

④ 計六奇《明季南略》，第1頁。

⑤ 文秉《甲乙事案》，《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430頁。

⑥ 錢海岳《南明史》，第二冊，中華書局，2006，第1頁。

⑦ 計六奇《明季南略》，第188頁。

⑧ 同上書，第1頁。



王子然，與常應俊等數人流離漂泊」<sup>①</sup>，「葛巾敝袍而已」<sup>②</sup>。福王一家是皇室近支中最早的落難者，1641年春，洛陽陷落，老福王朱常洵被李自成殺而烹之。福世子自此家破人亡，以至形如乞丐，該年二月，有大臣根據河南來人所述，向崇禎皇帝彙報福世子近況：「問：世子若何。曰：世子衣不蔽體。」時在隆冬，難怪崇禎聞言為之「泣下」，「發三萬一千金」派司禮太監王裕民專門前往「齎賑」<sup>③</sup>。1643年，崇禎批准他嗣位福王<sup>④</sup>，但此時崇禎自己已窮於應付、捉襟見肘，嗣位只是虛號，恐怕連兩年前的「三萬一千金」也拿不出來了，福王實際處境不會有任何改觀，依舊淪落底層，一文不名。眼下，船隊駛入淮安時，周王表現闊綽，「出行費給賞淮安各義坊」<sup>⑤</sup>，以此為見面禮；反觀福王，卻「橐匱，貸常滂（潞王）千金以濟」<sup>⑥</sup>。所借這筆錢，或即搬出舟中「寓湖嘴杜光紹園」的租住之用。大概，諸王將他捎到淮安已然不薄，繼續留舟中彼此均不相宜。可以想見，身無分文、黯然離舟，連以後過日子的錢都要靠別人調濟，這番光景下的福王真可謂窮途末路。據說，旬日之後，南京的大臣們前來覲見時，他是這樣一副形容：

王角巾葛衣坐寢榻上，枕舊衾敝，帳亦不能具，隨從田成諸闍布袍草履，不勝其困。<sup>⑦</sup>

然而，有道是「禍兮，福之所倚」。福王從花團錦簇、前呼後擁的王舟遷出上岸，孑然、伶仃地藉寓杜光紹園，當時固然淒清，事後看，其命運轉機似乎偏偏由此而來。那真是眨眼間峰迴路轉，極富戲劇性，不禁讓人油然想起，唯獨他的封號裏有一個「福」字。

① 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6頁。

② 同上書，第188頁。

③ 談遷《國權》，中華書局，2005，第5889頁。

④ 同上書，第5977頁。

⑤ 文秉《甲乙事案》，《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430頁。

⑥ 錢海岳《南明史》，第二冊，中華書局，2006，第1頁。並見《國權》第6066頁。

⑦ 文秉《甲乙事案》，《南明史料（八種）》，第431頁。

## 四

古云：國不可一日無君。4月25日以來，崇禎死國、北都淪陷，是明朝所受兩大重創。但換個角度也不妨說，明朝雖然頭破血流，卻筋骨未傷；北京統治機器雖然瓦解，南京這套備用系統卻完好無損，並且能夠立即啟動、投入運行——刻下，它只是缺少一位國君而已。

以最簡明的情形論，崇禎皇位繼承人屬於他的男性後代。崇禎凡七子，其中四人早夭，最晚出生的二位皇子，連名字都沒留下來。甲申之變時尚在人世的，是太子慈烺、皇三子定王慈炯<sup>⑧</sup>和皇四子永王慈炤。毫無疑問，他們都是皇位的當然繼承人，順序依長幼而定。問題是，到目前為止，三人下落不明。

既然失去簡明，複雜就趁虛而入。作為王朝的當務之急，南京的重臣們為此緊鑼密鼓、奔走忙碌，本來無可非議，甚至理所應當。然而，幾乎每個人都在其中打着小算盤。

「小算盤」主要有兩種，一是一己之私，一是集團利益。前者是指，通過擁戴新君撈取「定策之功」，瞬間大幅提升個人政治地位，成為政壇耀眼的明星、獲得巨大權力。後者則從政治派別利益出發，力圖確定一個符合自己需要的新君人選，考慮的重點在於謀求一位更易於合作的君主，這一結果的達成顯然同樣關乎權力。

打第一種小算盤的代表人物，是鳳陽總督馬士英。著名的東林黨人打的是第二種小算盤。

崇禎死訊南來之際，「定策之功」立刻成為許多人的第一嗅覺，個個騷然心動、躍躍欲試。此可藉路振飛一段話窺之：

有勸某隨去南京扶立者，此時某一動則淮、揚不守，天下事去矣。此功自讓與南國元勛居之，必待南都議定。不然，我奉王入而彼不納，必且互爭，自不待闖賊至而自相殘，敗事矣。<sup>⑨</sup>

⑧ 《明史》本紀第二十四莊烈帝二作「慈炯」，他著如《鹿樵紀聞》或作「慈燦」。

⑨ 計六奇《明季南略》，第6頁。《國權》同，見6077頁。